

中华文明共生传播视域下“三大全球倡议”的实践、历史和理论逻辑

谢清果, 杨婧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积淀出对人类如何共同生活的深层思考,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共生传播观”。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共生传播视域下深入剖析“三大全球倡议”所蕴含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 对于动员全球力量以重建国际文明新秩序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如此, 全球发展倡议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人文情思”, 全球安全倡议体现出中华文明的“生命关怀”, 全球文明倡议则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 而贯通其间的正是以“心传天下·和合共生”为内涵的共生传播观。

关键词: 中华文明; 三大全球倡议; 共生传播; 文明共生; 国际文明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4) 06-0040-09

当前,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加重,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 在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和“小圈子”行径与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拥抱全球化方向展开了博弈, 西方的地缘政治盘算导致局部地区动荡不安, 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 面对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倒退发展的局面,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 系统阐释了世界为什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实现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亚太地区安全受到威胁的时代背景下, 习近平主席在 2022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3], 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与“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面对立足文明中心主义的立场看待中国发展的西方国家,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4], 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文明理念、各国怎样实现交流互鉴”的时代之问。“三大全球倡议”的提出根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 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文明交往的角度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从本质上来讲, “三大全球倡议”讲的是一个问, 也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如何进行交流交往的问题。1996 年, 美国政治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系统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指出目前世界上所发生的冲突基本上都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 他也指出, 文明维系、联结和加强了同一文明集团的团结与排他性, 因此文明之间的冲突势不可免。而亨廷顿的理论基本脱胎于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 汤因比对于文明传播的观点则是: 政治和经济只是文明的表面现象, 而文化才是文明的血液、精髓和核心。^[5] 虽然他的文明理论的前提仍然是“西方优势论”, 但是他认为“文明间冲突唯一有意义的结果是带来和平”。不管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 还是汤因比的文明接触, 本质上他们讨论的都是人类的交流和交往问题。但是这些

学者关注的重点则是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关注的重点则是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文明形态的共生,强调文化传播的真正逻辑是奉行“求真”的务实观念,以“求善”的态度去建构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共鉴”的交往之道,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共生交往观”。^[6]

一、天下文明:“三大全球倡议”蕴含着中华文明共生传播的实践逻辑

“共生”一词最初是在19世纪由生物学家观察到不同生物之间广泛存在着“互利”现象而提出的^[7],其本身是一个生物学领域的词语,现代生物学家将这一概念表述为两种不同的生物密切地、专性地生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生物共生被延展到其他领域,拥有极为丰富的社会意义。美国芝加哥经验社会学派借鉴生物学中的共生现象,创立了人文区位学,他们认为社会是个共生系统,其内部各部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共生”是支配城市区位秩序的重要因素。我国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提出了“社会共生论”^[8],他站在全球发展的视角,对生态环境、人类社会、国际关系等领域中的主体关系进行了探索,指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实现“共生”的路径。学者袁年兴对共生哲学的基本理念进行了研究,从进化理念、共同理念、合作理念、互惠理念以及均衡理念阐释了共生的本质特征。中国古代所讲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其实就是一种共生论。^[9]既然共生可以被用来阐释人类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那么传播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传播关系的学科,自然也可以用共生来阐释人与人的关系,甚至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以及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日本学者尾关周二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从“交往”(Communication)角度,反省当时日本社会面临的校园“欺侮”问题、信息时代的电子共同体影响问题、日本的国际化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从而倡导“共生的理想”。熊文娟和杨近平分析了未来国际世界以文明和谐共生论作为交往准则的价值维度和实践的可能性,并阐释了文明和谐共生论的实践准则和主体。汪维和张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心探讨了互构——共生的文明关系生成的历史基础、文明逻辑以及现实实践,侧面指出了世界文明关系建构的未来发展方向。谢清果在《共生交往观》一书中创造性地阐释了“共生交往观”的具体含义,从中国古代传播理论思想解释了中国崇尚共生交往观的理论源泉和现实实践的可能性。虽然众多学者或多或少从传播学视角探讨了共生交往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关共生的传播理论,但是到目前为止,“共生传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作为独具中国古代传播意蕴的一个理论,我们认为共生传播观是以“和为贵”思想为基石、以天下观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核心,旨在实现平等、互利、包容、和谐的世界交往观念。

(一) 互利共生:以促进双方发展为目的的文明动力观

共生来源于不同生物、不同个体之间的“互利”现象,传播最开始被定义为信息的传播,是“双方交流对话”“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因此,共生传播的本质也是要实现互利,促进不同文明的和谐发展。二战前期的美国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经济危机时也是借助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恢复国家的正常运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借助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济的手段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不同类型的文明通过借鉴彼此的优势化为己用来促进自身的进步便是共生传播最典型的体现。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逐渐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松散共同体”,没有任何民族的文化能够完全不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只有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才能实现文明之间的互利共生。二战结束后,新生的亚非拉国家迫切

希望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在探索对外交往政策的过程中,周恩来于 1953 年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并将其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70 年来,在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以平等普惠的观念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多方面的合作。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首次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年 9 月和 10 月他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两者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不仅推进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扩大了我国的出口市场,对破除西方设置的贸易壁垒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务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2022 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 19.1 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参与国的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累计达到 2 万亿美元和 1.3 万亿美元,与共建国家政府、企业合作共建的海外产业园超过 70 个,并先后在共建国家实施了 300 多个“爱心助困”“康复助医”“幸福家园”项目。^[10]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使参与方贸易增加 4.1%,吸引外资增加 5%,使低收入国家 GDP 增加 3.4%。^[11]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等问题,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倡议”中特别强调要坚持普惠包容,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科技、医疗、生态、经济发展成果由全世界人民共享的步伐。在人类文明发展这个问题上,中国始终秉持着“互利共生”的理念与世界各国画出最大同心圆,推进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

(二) 和合共生:以“文明的和谐”为前提的文明价值观

“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后来被广泛应用到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关系,引申为和谐、和平、和善、和睦、中和等;“合”的本义是上下唇合拢,后来引申为多样事物的相合、汇合、融合、配合、联合、合作等。^[12] 先秦时期,《国语·郑语》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首次出现“和合”,指的是商朝能够调和“义、慈、友、恭、孝”五种礼仪教化,使“父、母、兄、弟、子”之间的关系和谐而成为统一体。“和合”集中体现在中国儒家提倡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伦理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以及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等。^[13]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处于普遍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国际政治系统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安全。二战后,美苏谋求世界霸权,造成北约与华约对峙、政治动荡、战争不断、军备竞赛、主权国家政权被颠覆等问题。进入美国或者苏联任一阵营的国家在得到安全保护的同时,也必须割让一部分主权。整个世界都笼罩在美苏冷战的阴影之中,个别地区甚至成为美苏争霸的主阵地。在危机四伏、政局动荡的世界背景下,中国历任领导者坚决把世界和平放在首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交往的准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友好交往。正如 1957 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所宣布的誓言,“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冷战结束后,部分西方国家仍旧以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带来了更大范围的动荡和战争,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西方国家所谓的“和平民主”只是“圈子内分赃的掩饰”,其本质仍旧是西方狭义的文明优越论和霸权主义。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习近平主席立足国与国关系休戚与共的实践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强调了全球互联互通、命运与共的属性。特别在促进“俄乌冲突”解决的过程中,中国以世界和平为基点呼吁双方尽可能以和谈的方式解决冲突,并公开表示“中方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站在和平和对话一边,支持国际社会汇聚更多共识,为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早日政治解决作出不懈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15]。当前西方国家企图以经济封锁方式孤立中国的新型冷战已经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大危害,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安全倡议”中指出:“只有基于道义和正确理念的

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3] 作为一个安全利益共同体,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只有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念,尊重其他国家的文明发展,才能实现文明的和谐和世界的和平发展。

(三) 和而不同:以“文明的差异”为基础的文明互动观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现在被用来强调在多元化环境中,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应当相互尊重、包容差异,通过交流沟通达到和谐相处的状态。早在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和谐才能让万物生长繁衍,而强求完全一致,则无法发展延续。中国古代历史有很多类似的名言,如“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世间万物都处于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共生发展,延伸到文明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美国一直将自身的文化看作是现代化的象征,他们往往把其他国家的文化视为需要改造的“他者”,而通过现代化来构建一个以美国价值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成为美国的伟大使命。二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将非西方国家纳入到其价值半径内以推行普世价值观以实现文化渗透,从而对世界各国实行隐蔽的霸权统治。在进行跨国交流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借助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影音产品、文化产品和工业制品,被美国文化圈禁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沦为美国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的附庸。长此以往,世界文明也只会有一种形态。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意识形态冲突已经成为阻碍当下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障碍,世界各国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文明秩序。而中国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文明的差异并不一定带来冲突,以差异为基础带动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也能够实现长久的和谐与发展。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到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都是以“文明共生”的底层逻辑透视世界文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足以证明我们追求的是“多元共生”“互利发展”的文明新形态,是超越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平等的新国际文明秩序。

二、万国咸宁:“三大全球倡议”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传播历史逻辑

中国古代的民族交往活动反映了历朝历代我国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交往的原则,也为当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和实践参考。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内部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多样的文明交往活动,这些活动成为中华文明发展最伟大的财富。“三大全球倡议”是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继承,也内生于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传播史,体现习近平主席对“未来世界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的伟大构想。

(一) 美美与共:以互利共赢促进民族间的经贸传播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多民族的经济交往史,体现了互利共赢的逻辑理路。作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华夏族稳定的生活方式相比游牧民族而言有着更多的精力来发展其他行业,如粮食、丝织业、酿造业、瓷器以及字画等文化产业。其他民族地处偏远,为获得生活所需的资源开始与华夏族进行贸易往来,如西北走廊的玉石古道、藏彝走廊的茶马古道、南岭走廊的香料古道等。汉初,贾谊提出了以物质手段来增强汉民族与匈奴之间的联系,既可维护边疆安定,又能够满足两个民族的物质需求。《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16] 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国与中西亚贸易往来的主要渠道,带动了中国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唐朝时期,来自中亚的商人将琉璃、珠宝、香料等稀奇珍宝贩卖给宫廷,也把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等产品带到中亚和欧洲地区,既满足了唐朝贵族对稀奇珍宝的需求,也从贸易中攫取了高额的利润。来自中亚甚至西亚

的胡商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进而走向中国各地,带来的是琉璃、珠宝、香料、象牙、葡萄酒、汗血马、拂菻狗、胡服、乐舞艺术与宗教文化,带走的是丝绸、瓷器、茶叶、铁器与“四大发明”。^[17]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不仅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范围,而且加深了统治者对于外来文化的认识,使统治者更重视夷物对国家致富致强的作用。周边国家在与中国贸易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也学习了先进的造船技术和其他手工业技术,变相地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可以说,古代中国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交往活动使得中国和周边贸易往来的国家形成了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共同体,对沟通东西方各国的商贸、科技和文化等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协和万邦:以天下观带动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民族传播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处世之道,其底层逻辑为以“天下”为视野的世界观。“天下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政教思想,也是统治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重要依据。“天下”是中国统治者在广袤的自然地理空间内对王朝统治地区的统称,包含“四海”和“九州”,实际上只是当时的政治思想家对于国家空间秩序的一种理想性的构想。它本质上还是缺乏对于国家边界明确的界定。从“天下”内部来看,华夏与周边民族只是存在着与天子距离远近的差别,本质上周边民族也是天下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既然周边民族和华夏族共处“天下”这个政治想象性的空间中,周天子作为王朝的统治者,自然是以“父母”的姿态处理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具体而言,中国古代家国本位的政治观念决定了王朝统治者自然将家庭的和谐也就是国家的和谐放在首位,而不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民族之间的纷争。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为了重建周礼所确定的上下尊卑秩序,强调“礼之用,和为贵”的政治主张。之后,儒学思想家孟子又提出了“仁爱”等主张,便逐渐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政治主张,并被汉代统治者所采纳。协和万邦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王朝统治者对外交往的准则。例如,汉代通过与其他民族建立姻亲关系来实现王朝统治和民族交往的和谐,唐代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明代郑和下西洋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也是通过朝贡体系与周边国家建立和谐的交往关系。总而言之,儒家以家国情怀治理天下事务的思想使得中国古代的民族交往实践出现了典型的“以和为贵”的特征。

(三) 百花齐放: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的国际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18]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场面,各个学派对时下产生的问题、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思想,并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最终形成了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多个学派、多种文化思想。在此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宽则得众”、墨家倡导的“兼相爱”、道家倡导的“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无不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深积淀的包容性价值。^[19]之后,即使汉朝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也有法家的学者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在与周边民族交流的过程中,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周边民族文化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并非完全将中华文化与周边文化隔绝开来。同样地,周边民族在进入中原地区后,统治者在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了继承,间接地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对外来文化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如唐朝印度佛教的传入、明清时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入、民国时期各种外来思想文化的引进。古代丝绸之路的联通汇聚了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让敦煌文化成为世界上最璀璨的明珠。近代的中国在困顿中觉醒,在吸收西方多种文化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未来发展的道路。从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来

看,中国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气度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最终形成了独具一格、包罗万象的文明传统。

三、文明共生:“三大全球倡议”体现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逻辑

在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视野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都不是现代化的文明,必须要经过西方文明的洗礼才能进入现代化。因而,当其他文明的生存空间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倾轧时,西方国家对此表示这是全球化的进程中每个国家必须要经历的环节。在现行的文明交往秩序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文明交往存在着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三大全球倡议”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共生传播的理论视野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视野,为构建人类文明交往新秩序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方案。

(一) 天下为公: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推动人类文明成果互连互通

“天下为公”语出《礼记》“礼运”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尧舜退位让贤之说可以说是“天下为公”思想的源流,刘泽华先生据孙希旦《礼记集解》之“天下为公者,天下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推论说,“天下为公”与君位禅让大致是相通的。^[20]以退位让贤为出发点,剖析退位让贤的内在逻辑便能理解“天下为公”这个词语的含义。首先,为什么要退位让贤呢?这是因为尧舜等人从所有民众的公共利益出发,为了促进族群的发展、部落的和谐所做的一些努力。其次,退位让贤证明尧舜等人并没有把自己的统治者身份看作是一个处于高位的角色,而是主张统治者更要俯下身来为民众服务。最后,出于公平公正的考量,尧舜认为并不能让天下在一家一姓之间流传。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天下为公”的“公”体现出了公平、公共利益,为人民考虑。孔子的“仁政”“为政以德”以及孟子的“民本”“民贵君轻”本质上都是在呼吁君主向尧舜、周王学习,从全天下人民的公共利益出发,才能够长久地成为统治者。先秦时期著作大都有频繁提到“天下”这个词语,足以证明当时的民众对于新的社会秩序的渴望和追求。因此,“天下为公”思想本身,正是把所有的诸侯、贵族、各种局部利益从属化、次要化的一种立场,它的根本诉求是华夏文明共生的新秩序。^[21]现代意义上的“天下”其实是全球这个场域,其公共利益也应当是全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和平与发展。赵汀阳在深入研究华夏文明的基础上重提了“天下体系”理念,认为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观是一种全域性的、天下无外的视角。相比美国仅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进而向全世界推行自身价值观的做法,中国则是将“天下观”作为思考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基石,从全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公共利益出发来解决世界上现存的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都是在“天下为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中生发出的战略构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存在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赤字,面临着“未来该怎么办”的时代难题。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习近平主席再一次从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未来世界的走向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只有重视人民的根本诉求,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才能走得更长远。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所指出的一样,“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2]。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方式,其他国家也不可能通过照抄别人的模式,便可以轻易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只有依据国家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法,在实践中找出适合国家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文明是人类社会实

践的宝贵财富，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方式，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都是人类发展史上散发着璀璨光辉的结晶。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应当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彼此协商调适，共同为全世界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而做出相应的努力。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倡议”中提出的一系列议程，如“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非盟《2063 议程》、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等同 2030 年议程充分对接”以及“不让任何一国、任何一人掉队”等，充分表明了中方愿承担起大国责任，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和发展，从而助力全世界人民幸福生活的实现。

（二）天下一家：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和而不同推进文明对话

“天下一家”针对的是不同地域、部落、氏族的和睦相处和民心凝聚的问题，关注的是“群”的关系。^[22] 周朝建立的五服制，从天子核心的王畿诸侯地方的藩属国进行逐层治理，天子与周边诸侯的血缘关系也逐渐淡化，从而生成了“天下一家”的思想萌芽。承继周礼的儒家学说也是以上下尊卑秩序划分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常被称为“内圣外王”之道，其中“外王”之道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而国而天下，这是古人视域由内而外的扩展。大国是小家的延展，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内含着君主和臣子的关系与小家庭中的父子关系相同的含义。自古以来，中国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生活习俗和礼仪教化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差异。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并没有强制少数民族实行与多数民族相同的生活方式，而是尊重他们的礼仪习俗，以“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交往宗旨调和内部与外部的多民族关系。他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大家庭，在保持和谐的前提下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在经济萎靡、地区冲突不断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命运再一次被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战争不能解决矛盾，只有和谐才是未来文明发展的方向。每个国家都要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这个问题，世界上过去不只有一种文明，将来也不会是只有一种文明。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明的多样性注定了文明之间存在着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之间一定会有冲突，或是存在着优劣之分。

全球化时代，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间的联系愈加紧密，逐步形成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预言的地球村。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全球化首先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意识，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已经被纳入了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23] 尽管西方国家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甚至主动施展逆全球化的实践行动，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同处于地球这个大家庭中，地区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安全和发展，整个世界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赵汀阳在解读现代政治体系时提到，现代政治的标志特征就是“边界”。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先锋，其政治意义上国家的边界感较强，在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等现代思想的影响下，认为除非实现政治体系等方面完全意义上的同化，否则地区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完全无法解决的。这也是西方国家多次与世界脱钩、干预地方冲突的根本目的，本质上是为了实现绝对的安全。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安全倡议”中指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我们认为，各国安全利益都是彼此平等的。”^[24] 每一种文明都是生活在此地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结晶，我们要肯定他们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肯定文明之间现存的差异。因此，在文明存在差异的前提下，每个国家应以世界和谐为己任，以对话协商解决因差异导致的冲突，以交流互鉴促进世界文明的多元发展。

（三）天下大同：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文明交往信仰

“天下大同”原文为“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指的是儒

家所追求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极为相似。费孝通在讨论民族文化如何共处这个问题是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用来形容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不是大同,而是和而不同。很显然,这个学者将“大同”理解为绝对的相同,偏离了费孝通原有的含义。费孝通于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术讲座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揭示和概括了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实体”和中国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融合过程与现实。^[25]面对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费孝通先生之后更侧重于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人文价值及其对人类文化关系的意义,致力于“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26]这是我国学者对于如何处理国家和国家、文明和文明之间关系的回答,更倾向于重视文明主体关系之间的和谐。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全球文明倡议”中所倡导的文明思想,“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4]。每个国家的文明都有其存在的必要,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是其人民选择和实践的结果,并没有所谓高低贵贱的标准。

西方国家认为文明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是“现存的差异”,只有实现一定的同化才能够避免战争等问题。汤因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持有悲观的态度,他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战争的问题,认为文明的不相容会带来战争,而战争最后的结果则是文明被同化。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欧洲已经率先进入了现代化进程,并奠定了现代化文明的基础,从而形成了“西方中心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得“西方中心论”这种意识形态获得了向外传播的动力,本质上它也是西方国家制造的文明扩张和价值观同化,这也是“美国文明中心主义”的潜在目的。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27]每一种文明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所形成的结果,时代在发展,文明自身也在发展,没有必要用停滞的眼光去看待某种文明。

文明的发展不可能有模版,资本主义国家走对的路不一定是适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文明的发展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而进行的,中间虽然有超越历史现存规律的阶段,但总体上都是要结合自身的文明传承和现实情况来发展的,不可能照抄其他国家现有的道路。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的,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4],“削足适履”式的发展适不适合只有自己知道,走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只能由自己来决定,其他国家是没有任何的权力来干涉别国的发展的。世界各国只有树立“和而不同”的国际文明新秩序,相互借鉴彼此的优势,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西方的普世价值,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文明的发展。

四、结 语

面对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的局势,习近平主席立足于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实践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跳出了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藩篱,从根本上反驳了西方所提出的普世价值,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人类文明新秩序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当下世界各国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只有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才能共同面对未知的挑战。我们要在实践中深化对“三大全球倡议”的认识,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人类更美好的未来生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 习近平. 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9-21 (2).
- [3]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422.htm.
- [4]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03-16.
- [5] 黄皖毅. “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渊源及其思想局限 [J].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 34-38.
- [6] 谢清果. 共生交往观的阐扬——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2): 5-13.
- [7] 王世进, 胡守钧. 共生哲学论纲 [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3): 71-84+123.
- [8] 胡守钧. 社会共生论 (第 2 版)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2.
- [9] 罗惠翹. 从“和而不同”到“和合共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J]. 民族研究, 2022 (6): 44-54+139-140.
- [10] 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0/content_6907994.htm.
- [11] 陈恒, 张雁. 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 成就与展望 [N]. 光明日报, 2023-06-27 (11).
- [12] 石书臣, 张金福. 中华“和合”文化的当代阐发与实践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9 (4): 46-54.
- [13] 李世安. “和合”文化与“文明冲突”——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文化 [J]. 史学理论研究, 2006 (3): 42-50+158.
- [14] 郑韬.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原创性贡献 [N]. 光明日报, 2024-07-12 (12).
- [15] 中国代表: 期待俄乌冲突双方相向而行尽早开启和谈 [EB/OL]. <https://http://www.news.cn/world/20240726/e1c66d5935004cb8b2b15f026cd3aba4/c.htm>.
- [16]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895-2913.
- [17] 高建新. 大唐长安与“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以唐诗为考察中心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 182-188.
- [18]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 [J]. 环境, 2024 (2): 10-11.
- [19] 青觉. 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民族政治文化解读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 18-22+26-28+5.
- [20] 刘泽华, 张荣明等. 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5.
- [21] 赵铁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及其现代回响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5): 31-38.
- [22] 向世陵. 儒家视域中的“天下一家”观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 (3): 9-15.
- [23] [德] 乌尔里希·贝克. 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 [M]. 路国林,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104.
- [24]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422.htm.
- [25]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J]. 北京大学学报, 1989 (4): 3-21.
- [26] 吴平清. 费孝通的“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思想——兼论民族研究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 [J]. 学海, 2014 (4): 24-32.
- [27]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